

本书受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即2016年专著出版与后期资助项目“体制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项目编号：JBK160804）和2014年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后续资助项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6CX141115）



体制转型背景下的 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

公共物品的第三种供给主体研究



杨海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序

《体制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公共物品的第三种供给主体研究》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著作,也是一项具有深厚学术基础的创新性成果。其学术价值在于:

(1) 对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两方面扩展:一是从公共物品供求矛盾的现象层面,深入到现象背后的经济主体行为层面,解释公共物品供求矛盾的深层原因。特别是重点分析了供给机制方面,提出从组织角度来思考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改善措施。二是借鉴关于公共物品的各种经典定义,将“社会风险”纳入到公共物品的分析范围,拓展了公共物品的研究范围。

(2) 初步构建了关于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个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民间公共组织命题感兴趣的研究者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

(3) 在梳理了关于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大量事实资料的基础上,强调两项重要因素:一是空间条件方面,中国地域内发生的各种事实具有中国特色;二是时间条件方面,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场景具有转型特征。这些研究成果具有拓展性和创新性,对于丰富和推进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组织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本书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针对这种现实情况,中央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正是在这种历史场景中,本书将“社会风险”纳入公共物品的分析范围,探索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路径,对于中国转型期社会有效减小社会风险和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从而凸显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命题的公共意义。

理论创新依赖于创新者的长期知识积累和学术历练。本书作者是一位从

事现代经济学教学科研的青年教授，在公共物品和公共组织理论研究领域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在该领域进行了多年研究积累，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的基础上完成本书，为中国公共组织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做出积极贡献。全书结构合理，逻辑严密，行文严谨，表达流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细致梳理的理论基础、缜密的逻辑论证、丰富的案例分析、翔实的资料、规范的注释，都能够让读者感悟到本书内在逻辑力量和作者严谨学术态度。

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是无止境的。正如作者所说，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是一个宏大命题，本书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限制条件下，对每种民间公共组织类型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具体分析。同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和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也给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带来了许多新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留下了一些未能完成的研究任务，例如，如何针对各种民间公共组织类型，进一步探究它们的现实发展障碍和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如何结合社会热点问题，进一步探讨各种民间公共组织的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如何继续完善关于民间公共组织的基本分析框架，通过问题分析的不断细化过程，从多角度来展示民间公共组织的现实图景，提炼出更具有理论价值的逻辑推理体系。当然，我相信作者在后续研究工作中将会有更多新收获，并衷心希望作者信守自己的承诺，在今后漫长的学术大道上继续努力前行，取得更多的创新成果！

是为序。

刘 灿

2016年4月12日于光华园

前　　言

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背景中，“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问题日益突出，深刻影响着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同时，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阶段性特征，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日益明显，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

本书试图将“公共物品”和“和谐社会”两大命题结合起来，把“社会风险”纳入“公共物品”的分析范围，从“组织”角度探求改善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有效途径。通过合理发展民间公共组织，探求缓解社会矛盾和降低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进而推动转型期中国社会朝着“和谐”目标发展。

一、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参照“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谋篇布局，本书主要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① 通过理论梳理和转型期中国社会场景分析，阐明民间公共组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② 通过对民间公共组织的四种典型组织形态进行案例分析，详细探究其发展路径和演进条件；③ 构建关于民间公共组织的一般化分析框架，提出政策建议，并由“经济意义”拓展到“社会意义”。

1. 第一部分：民间公共组织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意义

(1) 第1章梳理现有文献资料，从理论层面阐明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具体包括三部分：① 回顾“公共物品问题的学术渊源”，强调“公共物品”的研究范围呈现出逐渐扩展的规律，即由“有形的物品和服务”到“无形的权利主张和利益诉求”，再到“无形的社会价值观念认同”；② 介绍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的各种经典观点，探求改善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可能途径；③ 基于“公共物品”的“组织含义”，强调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理论意义。

(2) 第2章则将转型期中国社会设定为分析场景,从实践层面阐明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具体包括三部分:①根据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特征,说明目前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特殊性;②通过分析公共物品的需求特征和供给机制,揭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物品供求矛盾;③基于现实场景中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多维性,强调转型期中国社会更需要关注“无形共同需求”,应该依靠民间公共组织发展来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

2. 第二部分: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历史演进:案例分析

根据产生原因的差异,本书将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分为三种类型:①生产协作组织,典型案例是“农村专业合作组织”;②利益诉求共同体,典型案例是代表劳动者集体利益的“工会”和代表资本控制者利益的“商会”;③社会价值观念共同体,典型案例是“民间志愿组织”。

该部分是重点内容,即本书的第3章至第6章。针对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各种典型案例,借助历史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探究其产生原因、形成机制、现实发展状况、未来发展方向。具体内容如下:

(1) 该种民间公共组织形态的国外起源和基本发展趋势。

(2)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中,该种民间公共组织形态的产生原因和历史演进过程。

(3) 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下,该种民间公共组织形态的现实特征及其深层次原因。

(4)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中,该种民间公共组织形态的发展方向。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工会”不仅仅是政党组织的延伸;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工会应当成为代表劳动者集体利益的社会组织,目前大量涌现的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出租车司机协会等民间组织,正在逐渐成为劳动者集体利益的重要代言人。

3. 第三部分:转型期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和未来发展格局

基于前文的典型案例分析和大量事实资料,第7章着眼于归纳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演变规律,构建关于“转型期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一般化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1) “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梳理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共性特征,

根据上述四种典型组织的案例事实,从生成机制、动力机制、演进路径的角度,归纳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一般规律。

(2)“‘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空间视野中的公共领域混合格局”描述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未来图景。在多维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中,重点讨论三种关系:①民间公共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关系;②民间公共组织与市场企业的关系;③各种民间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

(3)“组织变迁与社会制度演进”则将研究命题的理论意义进一步拓展,由“经济意义”拓展到“社会意义”,强调民间公共组织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二、基本观点

(1)针对不同类型的民间公共组织,政府机构将会采取不同态度。具体而言:①对于“农村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类生产协作组织,政府机构采取积极扶持策略,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②对于“工会”等代表“劳动者集体利益”的社会组织,政府机构采取引导支持策略,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③对于“商会”等代表“资本控制者利益”的社会组织,政府机构采取适度监管策略,其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④对于“民间志愿组织”,政府机构采取“不反对、不支持”的策略,但如果该民间志愿组织具有较强烈的政治意图,则会受到政府机构的严格控制。

(2)针对“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命题,民间公共组织具有重要作用:①直接增加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利用民间公共组织的“自主治理”机制,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②间接协助政府机构提供公共物品,通过增强民间公共组织的信息传递功能,改善政府机构提供公共物品的现实状况。

(3)针对“和谐社会”命题,民间公共组织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润滑机制”,其主要功能体现在:①提供社会中介服务,满足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导致的社会需求膨胀;②缓解社会矛盾和减小社会风险,帮助政府机构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③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改善中国社会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

(4)发展民间公共组织,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的卸责。针对本课题的研究命题,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政府机构的重要责任包括:①政府

机构仍然是公共物品的最重要供给主体,它控制着公共物品供给的绝大部分资源,根据“权责对等”的原则,政府机构必须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②政府机构应该重视民间公共组织的重要作用,利用民间力量和社会组织灵活性,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三、后续研究问题

由于“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是一个宏大命题,本书实在无法在有限时间和篇幅条件下,对每种民间公共组织类型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具体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借助典型组织的事实资料,构建关于“民间公共组织”的基本分析框架。针对该书未能完成的研究任务,作者准备在后续研究过程中重点开展三方面的研究工作:

(1) 针对各种民间公共组织类型,进行深入而具体的分析。根据本书基本内容,后续研究将会重点分析四种民间公共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工会、商会、民间志愿组织。基于民间公共组织的基本分析框架,作者将继续采用历史分析和案例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依次详细探究各种民间公共组织的产生原因、形成机制、现实发展障碍、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

(2) 增加案例分析。在依次详细分析各种民间公共组织时,结合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案例,探讨该种民间公共组织的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借助关于民间公共组织的基础理论,具体分析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探究该种民间公共组织的现实发展策略。

(3) 在大量翔实资料和详细分析各种民间公共组织的基础上,或许很多年后,我们将会重新回到这个起点,继续完善关于“民间公共组织”的基本分析框架。通过问题分析的不断细化过程,从多角度来展示“民间公共组织”的现实图景,提炼出更具有理论价值的逻辑推理体系。

杨海涛
2016年夏于成都光华园

目 录

第 1 章 民间公共组织的社会起源和理论逻辑	(1)
第一节 公共物品问题的学术渊源	(1)
第二节 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	(9)
第三节 公共物品的第三种供给主体:民间公共组织	(15)
第 2 章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物品供求矛盾	(18)
第一节 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场景	(18)
第二节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物品供求矛盾	(25)
第三节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物品概念拓展:无形公共需求	(27)
第 3 章 生产协作组织的典型案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32)
第一节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理论渊源和事实证据	(32)
第二节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历史演进	(46)
第三节 转型期中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	(58)
第四节 转型期中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策略	(67)
第 4 章 利益诉求共同体的典型案例 I :工会	(77)
第一节 工会组织发展的世界经验	(78)
第二节 中国工会组织的历史变迁	(92)
第三节 体制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工会现实特征	(107)
第四节 中国工会发展的制度设计	(118)
第 5 章 利益诉求共同体的典型案例 II :商会	(132)
第一节 英国行会的历史起源和组织演变	(132)
第二节 中国传统行会的历史变迁	(162)

第三节 当代中国商会的现实处境	(184)
第四节 中国商会组织的未来发展	(202)
第6章 社会价值观念共同体的典型案例：民间志愿组织	(226)
第一节 全球志愿组织的发展趋势	(227)
第二节 中国志愿组织发展的现实格局	(246)
第三节 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现实困境	(262)
第四节 社会价值观念共享：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未来发展趋势	(278)
第7章 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发展格局	(297)
第一节 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	(297)
第二节 “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空间视野中的公共领域混合 格局	(311)
第三节 社会和谐：组织变迁与社会制度演进	(322)
参考文献	(329)
后记	(339)

第1章

民间公共组织的社会起源和理论逻辑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不断推进,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逐渐增加,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问题却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针对真实世界的公共物品供求矛盾问题,探求中国体制转型条件下的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机制,构成了本书意图和作者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

现实问题不是孤立的,梳理历史文献资料和学术传承渊源,将会凸显该研究命题的理论意义,这也是我们分析公共物品问题的理论起点。基于这种考虑,本章将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①“公共物品问题的学术渊源”,回顾各种公共物品理论的历史演变,特别强调对“公共物品”的范围界定;②“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介绍不同学者从多角度提出的公共物品供给途径。

第一节 公共物品问题的学术渊源

“公共物品供给”是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命题,对这个命题的任何理论分析都必须面对一个前置问题:什么是“公共物品”?事实上,学者们对该问题的答案构成了各种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析基点,呈现出公共物品理论的演变进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① 公共物品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渊源;② 奥意学者和瑞典学派的财政观点;③ 现代公共物品理论。

一、公共物品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渊源

在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公共物品”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虽然“公共物品”概念提出的时间较晚，但经济理论中的“公共利益”思想却具有悠久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时期。

1. 大卫·休谟：公共物品理论的思想萌芽

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中，“私人利益”是理论关注的重点，理论分析中的“物品”被锁定在“私人物品”范畴。然而，一些具有历史眼光和现实敏感性的学者注意到，如果全体社会公众都只关注私人利益，那就必然导致大量破坏社会公道的事情，从而引起社会混乱。为了维护社会公道和所有社会公众的私人利益，就需要两个重要条件：① 稳定的制度环境；② 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物质条件。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先驱，大卫·休谟在1739年出版的《人性论》中提到：某些任务的完成对单个人来讲并无好处，但对整个社会却是有好处的，因而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执行。他认为，人们具有追逐私利的天然动机，更加关注自己利益和“小家庭”利益，而忽视“大家庭”利益。^① 然而，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来看，“公共利益”是维护“私人利益”的重要前提，因此必须借助各种力量来满足“公共利益”，提供社会公众共同需要的制度环境和物质条件。事实上，虽然这种学术观点没有直接提出“公共物品”概念，但已经形成了公共物品理论的思想萌芽。

2. 亚当·斯密和穆勒：市场与政府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传世巨著《国富论》，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市场体系进行了充分论述。在分析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时，斯密提出，政府具有三项职责：“第一，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任何成员不受任何成员的侵犯或压迫，即设立完全公正的司法机构；第三，建立和维护个人或小团体所不感兴趣投入的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②由此可见，斯密不仅注意到“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问题，而且强调通过政府部门来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以维护公共利益。

^①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1133页。

^②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译，华夏出版社，2005，第494页。

其后,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在分析政府行为时,也经常触及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问题。虽然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公共物品”概念,但都以描述性语言探讨了公共物品的范围界定;在他们的理论文献中,“公共物品”包括国防、安全、司法、道路、桥梁、制度法律、基础教育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政府职责角度,提出了关于公共物品的范围和供给方式的许多重要理念。

二、奥意学者和瑞典学派的财政观点

19世纪80年代以后,奥意学者和瑞典学派在分析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方面;他们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到财政领域,构建了“威克塞尔—林达尔模型”和“鲍温模型”。

1. 奥意学者对公共物品的分析

(1) 1890年马佐拉在《论财政科学》中分析了公共物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他认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存在差异,公共物品不能被分割使用,也难以排除不付费者。

(2) 奥地利的萨克斯则对“公共需求”进行细分,将之分为“个人的集体需要”和“集体需要”;前者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需要,后者是全体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需要。

2. 瑞典学派对公共物品的分析

(1) 威克塞尔特别关注政治程序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强调通过民主政治决策来决定课税问题,并且指出政府不是利他主义者和全能者。

(2) 林达尔则对威克塞尔的思想进行模型化,以市场自愿交换方式来模拟公共物品配置过程,其理论模型与鲍温理论合称为“自愿交换理论”;同时,他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公共物品”概念。

三、现代公共物品理论

现代公共物品理论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起点是萨缪尔森提出的“纯公共物品理论”,随后引起马斯格雷夫、布坎南、斯蒂格利茨、奥斯特罗姆等人的学术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公共物品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 萨缪尔森:纯公共物品理论

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文章《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对公共物品的性质和有

效供给机制进行详细分析,这标志着现代公共物品理论的建立。萨缪尔森将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集体消费物品”^①,“私人物品”的性质是“该物品的消费总量等于所有消费者的消费之和”;“集体消费物品”的性质则是“每个人对此类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何其他消费者的消费”。

在随后的1955年,萨缪尔森又发表《公共支出理论的图解》,用“公共消费品”概念来替代“集体消费品”概念。^②在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中,萨缪尔森第一次明确给出“公共物品”的定义。他指出:“公共物品是指这样一类商品,将该种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③

同时,萨缪尔森概括了公共物品的三项基本特征:(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物品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和联合消费,其效用不能分割为独立部分,不能分别归属于单个经济主体。

(2)消费的非竞争性。某个经济主体对公共物品的享用不会影响其他人享用该物品,即边际成本为零。这意味着,①边际生产成本为零,不需要增加资源投入;②边际拥挤成本也为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满意程度。

(3)受益的非排他性。公共物品被提供出来之后,就不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消费。由此衍生出三层含义:①即使单个经济主体有独占念头,但由于技术困难,他也无法将其他人排斥在该物品的受益范围之外,特别是无法拒绝那些没有付费的使用者。②即使单个经济主体不愿意,他也不得不强制性地接受公共物品。③任何人都可以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物品。

(二) 马斯格雷夫:公共物品和有益物品

沿着萨缪尔森的思想路径,马斯格雷夫将物品分为三类:私人物品、有益物品、公共物品。他对“有益物品”的概念界定是,当权威机构对该物品在市场机制下的消费水平不满意时,它甚至可以在违背消费者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对该物品的消费进行干预。例如,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和廉租房。

马斯格雷夫强调,有益物品和公共物品都是“非私人物品”,它们不能通过

^① 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36(4), pp. 387—389.

^② Samuelson, P. A. “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5, 37(4), pp. 350—356.

^③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第29页。

市场机制来实现优化配置,而必须依赖于政府职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非私人物品”又被称为“政治经济物品”。

根据马斯格雷夫的观点,有益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区别在于是否尊重消费者的个人意愿和消费偏好。具体而言:(1)政府提供有益物品不需要考虑个人偏好,甚至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条件下进行强制消费。(2)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则必须尊重消费者的个人偏好,由于技术特性使得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机构来提供。

需要指出的是,在萨缪尔森和马斯格雷夫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构建了“公共物品的一般化模型”。该模型将物品分类由离散型扩展到连续型,从而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中间状态”进行一般化处理,使得公共物品理论更加趋于标准化。

(三) 布坎南:俱乐部物品

针对现实世界中的物品复杂性,1965年布坎南发表文章《俱乐部的经济理论》,指出萨缪尔森的物品“两分法”太简单,忽略了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混合物品”。他认为,现实世界中的物品不能简单地归属于“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两者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明确界限,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物品特征的连续变化过程,真实世界中的所有物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公共属性”。沿着这种思路,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物品”理论,重点分析两个核心问题:①俱乐部的最优规模;②俱乐部成员对俱乐部物品的最优消费数量。

布坎南提出的“俱乐部物品”理论具有两项假定条件:①对于俱乐部以外的社会成员而言,俱乐部物品具有排他性;而在现实世界中,物品的“排他性”特征与产权制度具有密切关系。②俱乐部内部的所有成员对俱乐部物品具有相同偏好,他们从该物品中获得相等效用,因此他们对俱乐部物品的供给成本分担方式是均等的。

针对第二项假定条件,布坎南强调,如果俱乐部物品对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存在差异,那么俱乐部物品的供给成本分担方式就不会是均等的。进而言之,针对俱乐部物品的供给成本分担方式,俱乐部成员必须进行集体决策,这就必然产生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谈判成本”。随着俱乐部规模的扩大,这种“谈判成本”将会急剧增加;当俱乐部成员付出的“谈判成本”超过了从俱乐部物品中获得的收益时,俱乐部就会崩溃。

从学术渊源上来看,布坎南的“俱乐部物品”理论是对以前公共物品理论的拓展。它通过假定条件来破解“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难题:①针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搭便车”问题,提出“排他性”假定;②针对公共物品的成本分担问题,提出“个人偏好相同”假定。

(四) 多重维度的物品分类

在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理论中,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这两重属性是彼此独立的,这就形成了多重维度的物品分类标准,可以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中间状态”进行深入分析。

1. 布朗和杰克逊的观点

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布朗和杰克逊根据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双重维度,将真实世界的所有物品分为四种类型,并且分析了每种类型物品的排他性程度、供给主体、分配方式、融资方式。详见表 1-1。

表 1-1 布朗和杰克逊的物品分类^①

	排他性	非排他性
竞争性	<p>纯私人物品</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排他成本低。 2. 私人企业生产。 3. 由市场分配。 4. 通过销售收入融资。 <p>实例:食物、鞋子。</p>	<p>混合物品:公共资源</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利益主体共同消费,但受拥挤限制。 2. 私人企业或公共部门直接生产。 3. 由市场分配或政府公共预算分配。 4. 通过销售收入或税收融资。 <p>实例:公共花园、公有财产资源、公共游泳池。</p>
非竞争性	<p>混合物品:俱乐部物品</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具有外在性的私人物品。 2. 私人企业生产。 3. 由包含补贴或税收因素的市场分配。 4. 通过销售收入融资。 <p>实例:学校、交通系统、医疗保健、有线电视、不拥挤的桥梁、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俱乐部。</p>	<p>纯公共物品</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很高的排他成本。 2. 公共部门直接生产或由与政府签约的私人企业生产。 3. 由政府公共预算分配。 4. 通过强制性税收融资。 <p>实例:国防。</p>

^① [英]布朗、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第 4 版),张馨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 30 页。

2. 奥斯特罗姆夫妇的观点

根据排他性和共用性的差异,奥斯特罗姆夫妇将真实世界的所有物品分为四种类型:私益物品、公益物品、收费物品、公共池塘资源。详见表 1-2。^①

表 1-2 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物品分类

	分别使用	共同使用
可 排 他	私益物品 实例:面包、鞋、汽车、理发、书。	收费物品 实例:剧院、夜总会、电话服务、收费公路、有线电视、电力、图书馆。
不 可 排 他	公共池塘资源 实例:地下水、海鱼、地下石油。	公益物品 实例:社群安全、国防、灭蚊、空气污染控制、消防、街道、天气预报、公共电视。

3. 萨瓦斯的观点

根据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程度不同,萨瓦斯对物品的二重性进行了连续型处理,将真实世界中的各种物品标示在平面坐标系中的相应位置。详见图 1-1^②。



图 1-1 萨瓦斯的物品分类

^①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益物品与公共选择》,载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毛寿龙、李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第 102 页。

^② [美]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 80 页。

4. 奥尔森的观点

1965年奥尔森出版《集体行动的逻辑》，对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理论进行拓展。根据排他性、竞争性、拥挤程度的三重维度，奥尔森将真实世界的所有物品分为8类。详见表1-3。

表1-3 奥尔森的物品分类^①

	竞争性	非竞争性
排他性	不拥挤：私人物品 市场供给。	不拥挤：收费物品 在零价格条件下，无法实现私人有效供给；在价格为正的条件下，也会出现消费不足。
	拥挤：具有消费外部性的私人物品 消费者对市场价格而不是对边际社会成本作出反应。	拥挤：有拥挤的收费物品 如果市场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则能够实现私人有效供给。
非排他性	不拥挤：免费物品 在零价格条件下，供给充分。	不拥挤：纯粹公共物品 私人供给不可能。
	拥挤：自由进入和公共产权的资源 消费者对私人边际成本作出反应，从而导致过度消费。	拥挤：具有消费外部性的公共物品 消费者会忽视外部成本，从而导致过度消费。

（五）蒂博特和布雷顿：地方性公共物品理论

(1) 沿着布坎南的“俱乐部物品”思路，蒂博特在1956年发表文章《地方支出的纯理论》，提出“地方性公共物品”属于“俱乐部物品”，包括地区范围内的治安、消费、教育、医疗、法庭等。^②他强调，地方性公共物品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提供，由于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具有差异性，因此居民将会通过“用脚投票”来进行选择，迁移到地方性公共物品更好的地区。

(2) 根据公共物品覆盖的地域范围，布雷顿将公共物品分为三类：①全国性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全国范围的制度体系、基础研究、国防、电视、广播频道等。②区域性公共物品，主要覆盖大区域范围。③地方性公共物品，主要指地

^①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3页。

^② 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y*, 1956(5), pp. 416—424.